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教育话语生产与传播面临困境与突破路径

余凯, 武璟璐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北京 100875)

摘要:教育话语是国家宣传教育政策、传播教育理念、树立教育形象的重要方式。“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更好地生产与传播中国特色教育话语,提高国际教育话语权。我国教育话语生产与传播目前一定程度上面临着教育话语生产性较弱、话语产品响应性不足两方面的困境。针对种种困境及其根源,本文建议:注重发扬本土文化,进行话语的本土构建;兼顾多样性与普遍性,提高话语适传性;平衡意识形态表达,重视话语柔性输出;借助公共产品,扩大话语传播途径等。

关键词:“一带一路”;教育话语;话语构建;话语传播;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22)01-0123-07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际社会给予了广泛理解、认同、支持和参与。根据“一带一路”大数据平台公布的数据,我国已经累计同122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1份政府间合作文件,仅2018年,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就超过了60个。各个国家之间形成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发挥中国力量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更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中国政府借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力量,依托各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充分利用学术组织和社会团体等交流平台,深入开展各项务实教育合作交流,制定教育政策的语境也从本国扩展到了区域乃至全球。有鉴于此,凝聚中国特色的观念共识,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话语,增强中国的教育话语权,不仅是增强国家话语表达权力的内生要求,更是中国深入参与区域教育合作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应有之义。

教育话语是一国话语在教育领域中的表达,是在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关教育的具体表征,也是按照一定的逻辑与规则进行组织整合构成的一套传递着特定教育价值体系和教育行为准则的符号化话语体系。同时,教育话语需要通过一定的教育实践活动和话语产品向受众进行传播,从而唤起广泛的认同。因此,建设教育强国,除了优先发展教育,进行教育和科技创新以外,具有强有力的教育话语权也是重要指标之一^[1]。

一、中国教育话语生产与传播面临的困境

当前,各个国家参与教育全球治理的愿望日趋强烈。教育话语作为国家文化与软实力的产

作者简介:余凯,教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若干政策问题的实证研究”(2012WZD01),项目负责人:余凯。

物,其本身的生产和传播也成为各国参与国际教育治理的重要路径,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就实际情况而言,我国目前尚未进入国际教育话语生产与传播的核心领域,在教育话语与话语产品的传播中也面临一定的困境。以学术期刊为例,2010至2019年,中国SC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数占全球SCI论文总数的1.72%,同期中国作者发表的SCI论文数占全球SCI论文总数的比例达18.06%。10年间,中国作者共发表SCI论文275.5万余篇,其中2.2万余篇发表在中国SCI收录期刊上,仅占8.10%。2019年,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基于13088种(含中国期刊1429种)世界范围内传播较广、影响面较大、影响力较强学术期刊,发布了世界期刊影响力指数(WAJCI),其中我国仅有5种社科期刊进入世界前5%,37种社科期刊进入世界Q1区,96种社科期刊位列世界Q2区^[2]。中国优秀科技论文争相到国外期刊发表、创新成果在国外期刊首发、中国优秀期刊国际影响力有待扩大等现象凸显出目前国内科研成果和人才评价在话语权方面的缺失。究其表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教育话语生产性较弱

当前中国教育话语的弱势主要表现为学术话语的西方化,包括理论话语、实践话语以及学术评价话语的西方化。

首先是教育理论话语西方化。纵观我国教育学的百年发展,大体经历了从引介日本教育的概念与命题、学习和译介美国的教育理论、从苏联引进社会主义的教育理论再到全面引介西方教育理论的大体流程^[3]。可以说,西方教育话语在我国教育理论的本土化发展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一直持续至今。在另一方面,中国教育事业过去40多年的发展,是无法简单套用任何国外发展理论进行诠释的。这是挑战,同时也为中国教育话语的生产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尽管当前我们已经在教育理论的本土化构建上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不可否认,在追赶与超越的过程中,相当一段时间内还会较大程度地受西方学术的话语与规则的影响,本土教育理论话语的建构还任重道远。

其次是教育实践话语西方化。近代以来,在不断引入西方教育理论背景下,从我国教育改革的基本理念到课程改革模式与具体的教学方法,都不难发现西方教育理论的影响。以教育管理研究为例,“在问题意识上,我国教育管理实践中大量的真实问题没有得到国内学者足够的重视,要么追求圈地式的学科体系建设却在抽象的理论言说中走向画地为牢,要么热衷于以跟随、模仿、验证等重复劳动试图复制其他学科或者国外理论已经时过境迁的辉煌图景,具有中国本土经验同时又符合普适意义的教育管理研究因而变得更加稀缺。”^[4]然而,中国地域广阔,教育形态多样,从教育实践中衍生的经验复杂而庞大,直接搬运西方教育实践经验,实在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土壤中衍生出的教育问题,既无法催生中国本土的教育理论与实践话语,更重要的是,中国教育实践中大量的真实问题没有得到国内学者足够的重视,也就难以对外讲好中国教育改革故事。

另外,学术评价话语西方化。近几十年来,我国一直在追求与国际学术接轨,“在国际公认的学术平台发表成果”成为得到国际认可与“成功接轨”的必经之路,而所谓的“国际公认的学术平台”,通常就是指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建立的SCI、SSCI、AHCI三大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学术期刊^[5]。在国内学术界破“五唯”之前,在国际高影响因子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一定程度是研究人员考核评价指标中的重要因素,但学术成果量化分级评价在增强学术评价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同时,也有将其过于简化的倾向^[6]。同时,这种将学术评价抽象为在三大引文索引收录期刊发表论文的行为也使得学术的国际化一定程度上与学术西方化画上了等号。“评价机构告诉我们,学术成果质量的优劣高下,得由‘国际’说了算,而这个‘国际’就是三大索引系统,我们除了妥协,

别无选择,道理很简单,所有的标准和规则都由‘先行者’和‘领航者’说了算,‘准入证’攥在人家手里,我们几无话语权可言”^[7]。这种“学术评价话语转让”的现象一定程度加深了国内教育领域学术话语生产的弱势地位。

(二)话语产品响应性不足

教育话语的目的不仅在于言说,更在于获得响应。在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过程中,中国积极发声,并将话语转化为实际行动,向国际提供了诸多的教育产品,如创办孔子学院、鼓励来华留学以及创设国际高校联盟。此类教育交流与合作行动不仅是中国教育话语实力在实践层面的投射,更是中国教育话语传播的重要渠道。但在具体实践中,这些话语产品的传播却面临一定的困境,在国际上的响应差强人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教育话语弱势的现状。

首先,孔子学院建设滞缓。孔子学院是增进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教育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办学平台。截至目前,全球已有 162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541 所孔子学院和 1 170 个孔子课堂。但有学者指出,在“一带一路”建设核心区的孔子学院建设中,存在师资短缺与教材匮乏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孔子学院的师资组成多为外派与志愿支持,对外汉语教师的本土培养情况并不理想,教材方面也缺乏适应各地本土教学的融合教材^[8]。由于其尚未实现与当地文化的良好融合,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文化与教育交流功能的发挥,难以凸显文化传播与对话的阵地作用。

其次,留学事业发展不平衡。人才培养培训合作在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话语交流上有着重要意义,其中最主要的途径是推动对外留学及来华留学。目前我国在推动来华留学方面尚存不足,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外出留学人数与来华留学人数的巨大逆差。基于 IIE 和 OECD 两家机构在 2017 年发布的相关数据,对比美、英、澳、韩等国家,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留学生(含非学历生)所占比例为 1.1%,远低于其他主要留学目的国,但在外出留学人数上,中国已然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9]。在另一方面,我国针对来华留学生的专业设置集中,不符合来华留学生长远发展需求。比如,相比欧美高等学校在东南亚海外分校所开设的金融、国际证券投资、工程技术、计算机科学等多种专业,我国高校对接东南亚来华留学生所开设的有关学位项目更多还是在语言、文学和医学等领域^[10]。这种单一类型的人才培养模式远远不能契合“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人才培养培训的标准与要求,也无法实现以人才交流促进话语、文化交流的目的。

另外,教育共同体推进乏力。高校作为国家教育对外开放和人才培养与创新的主阵地,在教育话语输出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近 70 所高校已经出台了全球规划,同时在政策推动下,国内高校联合“一带一路”国家高校成立了大大小小 30 多个战略联盟^[11]。在高校联盟迅速催生的表象下,可持续发展问题初步显现。如有学者指出,部分高校联盟存在主体参与热度不均衡的问题,往往是牵头高校热情高,甚至是牵头高校一家出力,其他联盟成员积极性不高,或者是前期参与热情高而后续乏力^[12]。教育联盟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对我国教育话语的传播形成了掣肘。

二、中国教育话语困境产生的根源

话语是对文化的认同与对权力的校准。中国教育话语与其产品在传播中所面临的具体困难和深层次的矛盾其实折射的也是不同文化与权力的剧烈斗争。

(一)文化霸权主义影响话语生产

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教育交流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已经日渐凸显。自 19 世纪黑格尔奠定“西方崛起与东方停滞”之说的基调,将东西方进行二元划分,以东方之“停滞”反

衬西方的自由与进步,西方社会就普遍认为是西方文化思想的传入拯救了东方“停滞”的社会。尽管近几十年来,非西方国家越来越展现出自身文化的历史性与独特性,但欧洲国家鼓吹的“西方中心论”及美国主张的“地缘政治博弈论”这类观念仍然深刻影响了世界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构成。西方话语在国际学界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渲染成具有文化普遍性和代表性的思想,对其他文化和话语产生了较强的排他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西方国家利用其成功的经济模式和强势的价值观念,不断向其他非西方国家强力推广其文化理念,并在各个领域保持一定的话语优势,教育领域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包括我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为了寻求国际学术的准入通道,争夺一定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又必须运用西方的学术话语和学术平台。在这一不公平的学术角力中,西方国家利用学术话语控制权,使其价值观念与研究在非西方国家的支配地位得到巩固^[13],同时也使全球学术界的话语同质化现象日趋明显。

(二)文化过度异质阻碍话语认同

从跨文化认同的角度来说,话语的传播与接受实质上代表了知识与文化的认同与交流,这一过程实质是一种走出社会隔离范畴与狭隘文化分野的交往行为。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个体会经历文化认同的个体化与普遍化两个过程,在领悟到人类的统一性和文化价值的普遍性之后,通过摆脱文化偏见,形成综合化的认知结构并欣赏多样性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14]。

在文化对话实践中,人们常常忽视文化普遍性在促进文化交往中的重要作用,而把各群体和社会所具有的文化独特性和多样化特征视作促进文化交流、革新和创造的主要源泉,致使在话语表达中过分强调文化的特异性。事实上,由于文化发源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代表了不同群体的利益与意识形态,文化的多样性在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会呈现出明显的族群中心主义倾向,它在推进了文化主体性形成的同时,也造成了诸多跨文化交往的障碍^[14]。因此,在国际对话中,如果在话语表达及文化内涵上表现出强烈的异质性,往往很难获得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文化上的认同和话语上的共鸣。换言之,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过程中存在着“此时此地的有效性越强,彼时彼地的影响性越弱”的悖论。中华文化在东亚及东南亚的广泛传播和在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接受度形成鲜明对比,也与此悖论不无关系。

(三)意识形态制约话语传播

意识形态特征是所有文化体系共同的本质特征。话语作为知识与权力的表征形式,其实质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言说,教育话语也概莫能外。

一套成熟的国际话语体系其生产不仅意味着对于外部世界的科学研判和准确界定,还意味着匹配该国国情与意识形态现状,满足国家的实际需求,站在国家立场完成国际表达。作为教育与政治关系的映射,教育话语与意识形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国际话语体系传播与文化交流的实践中,意识形态意蕴常常成为阻碍文化认同和话语传播的关键因素。正如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指出的,文化的融合在根本上是一种承认的政治^[8],文化与其话语表征的交流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当今世界,各种意识形态的交锋不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且已成为事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较量^[15]。正如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际,西方各国也围绕相关焦点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一些学者仍无法摆脱偏见,对该倡议在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国际秩序方面的作用进行了误读。以韩国、印度及美国为代表的部分专家学者认为,中国提出该倡议的目的在于平衡当前世界体系中的大国关系、重绘全球版图以获得更大的财富和权力范围。这类观点完全将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看作是帝国主义的扩张^[16]。由此可以看出,在西方国家话语权强势的背景下,作为国情和意识形态迥异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话语的传播

过程中总是受到西方叙事别有用心的揣摩与有意无意的曲解。这也极大影响了我国教育话语的有效传播。

三、中国教育话语生产与传播的困境突破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正式公布,标志着我国“一带一路”构想开始从政策倡议阶段进入政策规划阶段。“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合作,更是全方位全领域的长远深入合作,其中教育合作与学术交流具有重要的地位。无形的教育理念和体系文化的交流和圆融能够促进各国原有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而这种交融很大程度依靠有效的对话来实现。因此,充分构建国家特色、国际认同的教育话语体系不仅是增强我国教育竞争力的真实需要,更是深入开展区域教育合作、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合理诉求。针对目前我国教育话语及其产品在传播中面临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以期能改变以往我国教育话语弱势的状况,真正在国际舞台做到话语在场。

(一)发扬本土文化,进行话语的本土构建

每个国家的发展都基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因此,其教育也都有自己特殊的生长背景与实际需要。相应的教育话语,包括言说方式、价值体现、概念表达等的生产,也只有首先基于本土的文化与实践,才能更好地解释教育现象、阐发教育问题、组织教育理论。因此,摆脱西方话语控制,构建中国特色教育话语体系,应当充分尊重教育的民族性与本土性。

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包括知识体系的生成、教育观念的树立与教育理论的沉淀。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审视,可以对其中一些本土教育概念进行再利用,以描述和分析教育现象。譬如“师道尊严”,它的内涵不是西方现代教育科学中诸如“教师权威”之类的概念所能全部容纳的^[13]。此外,强调对于历史的观照并不在于试图从历史中找到某个问题的答案,而在于通过对历史的省思,探寻今天所面临的各种各样教育理论问题的基点与中国现实教育问题存在的根源^[17],以找到构建本土教育话语体系的文化根据。总而言之,教育话语只有在“土生土长”的基础上,才能赢得自身发展,并建立与整个世界的双向对话交流机制。

(二)兼顾多样性与普遍性,提高话语适传性

话语的功能在于言说与传递,因此必然有受众,即中国与之对话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由于这些国家与地区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民族以及宗教方面具有多样性,如“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与地区并非由单一民族或单一教派组成,在教育方面的关注点与实际需要也具有差异性。因此,为解决由于文化差异性而出现的话语传播停滞不畅的问题,我国在构建教育话语体系的过程中要注意话语的适传性,充分提高话语的可接受度。

首先是内容适传性。应当认识到文化不仅具有差异性,更具有普遍性。没有文化普遍性的前提语境,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便无从谈起。事实上,话语的传播与认同其实是在差异前提下寻求同一的过程。人们在接受跨文化传播的内容时,通常会进行选择性与理解。在信息的选择上,同质间的传播明显比异质间的传播更为有效。因此,我国在构建教育话语时,应当保持对教育共同内核的持续关注,在中国特色表达的基础上与受众群体的普遍性保持一致,确保达成有意义的分享^[18]。其次是话语传播方式的适传性。话语的传播必然要借助大众传媒,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为了取得更为理想的传播效果,应尽可能利用对方能接触到的世界性媒体或对方比较惯常使用和接受的交流平台。在教育领域,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和 Springer-Verlag 共同主办,荷兰 Brill 出版社负责海外发行的英文学术期刊《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在国际影响因子和影响力指数上都有着不俗表现,这也起到了加强中国与国际学术交流的作用^[19]。因此,我国

应当持续推进国内学术期刊等交流平台走出去,不断提升中国教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

(三)平衡意识形态表达,重视话语柔性输出

教育话语作为知识与教育权力的表征,往往促成现有治理秩序与合法文化的再生产。正如威尔伯所说,“任何社会对传播机构的控制都出自社会本身,代表着其信仰与价值观”^[20]。不可否认的是,教育话语与权力话语的高度一致,也为教育话语的传播带来一些阻碍。因此,在构建中国特色教育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应当在认识意识形态差异、把握意识形态方向的前提下,突破话语的权力框架,强化教育话语的交流性。具体而言,一方面为准确表达我国教育、文化的交流意图,避免西方国家对我国教育话语的过度解读,应当在话语构建时创设出一定的语境来减少对话方在认知或反应上的偏差。另一方面,应当给予教育学术话语与教育话语产品,如学术期刊、孔子学院、办学联盟等平台相对独立和自由的话语空间,重视教育话语的文化性质。在我国教育、文化参与国际对话的过程中,基于共同需求开展学术协作与教育合作,既要避免泛意识形态化又要避免去意识形态化两个极端,才能构造更富有交流性与传播性的教育话语体系。

(四)借助公共产品,扩大话语传播途径

作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重要的经济体,中国在当今国际实力分配体系中已经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同时,中国在稳定经济秩序、维护环境安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等^[21]方面的重要贡献也奠定了中国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良好基础。其中,“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提出的重要公共产品。公共产品与话语的关系在于公共产品的实施需要话语权来保障,而公共产品的良好运行又能够促进话语的传播与话语权的提升。因此,要想构建中国特色教育话语体系,除了从丰富传统文化内涵、注重话语适传性、平衡意识形态表达等方面争取国际话语优势之外,还应当借助公共产品,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优势,充分拓宽我国教育话语的传播路径。

具体而言,首先,应当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及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上海合作组织等其他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实现与各个国家在同一平台上的平等对话,以此扩大国家间沟通与交流,拓展国际教育合作空间。其次,发挥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孔子学院的对话与传播作用。孔子学院不仅是汉语传播与汉语人才培养机构,更是实现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平台。要发挥孔子学院对教育话语传播的阵地作用,需要孔子学院彰显中国特色,融合当地文化,形成品牌效应,真正成为当地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具有影响力的中华语言与文化传播中心。再次,应当充分开发“一带一路”倡议下各高校联盟的平台作用。国内高校应当立足自身特点,找准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发挥组织和先导作用,增强自身竞争力,促进联盟纵深发展,为我国教育话语传播提供平台与实力保障。最后,应当提升中国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在中国教育学术成果日益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将提升质量与影响力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中国学者也应打破目前对于境外同行的依赖,提升自身知识生产的独立性,逐渐转变身份,由学术边缘地带加入到核心领域,真正成为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者。

参考文献:

- [1] 兰茂景. 论科学中心转移与中国教育的超前发展[J]. 宁夏社会科学, 2013(1):145-147.
- [2] 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 世界期刊影响力指数(WJCI)报告[R].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020.
- [3] 张家军. 教育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教育学话语权之思考[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4):112-116.
- [4] 余凯, 杨烁. 教育管理研究的范式问题与方法变革——一个技术倡议[J]. 教育学报, 2020(5):36-42.
- [5] 党生翠. 美国标准能成为中国人文社科成果的最高评价标准吗? ——以 SSCI 为例[J]. 社会科学论坛, 2005(4):62-72.
- [6] 朱剑. 重建学术评价机制的逻辑起点——从“核心期刊”“来源期刊”排行榜谈起[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 (1):5-15.
- [7] 朱剑. 学术评价、学术期刊与学术国际化——对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热潮的冷思考[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126-137.
- [8] 雷启立,常冬. 跨文化传播的困境与可能——以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发展为例[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63-67.
- [9] 金帷,周曼丽. 来华留学教育事业发展趋势与策略选择[J]. 高教发展与评估,2020(4):21-33.
- [10] 鲍东明,曾晓洁,张瑞芳.“一带一路”建设核心区对外开展教育交流合作情况调研报告[J]. 比较教育研究,2016(12):8-15.
- [11] 朱以财,刘志民. 从“共建”到“共鸣”：“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的价值取向[J]. 教育学报,2019(5):70-79.
- [12] 朱以财,刘志民.“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建设的现状、困境与路径[J]. 比较教育研究,2019(9):3-10.
- [13] 项贤明. 比较教育:话语与权力[J]. 高等教育研究,2002(2):95-99.
- [14] 戴晓东. 解读跨文化认同的四种视角[J]. 学术研究,2013(9):144-151.
- [15] 邹绍清. 论意识形态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建构[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37-41.
- [16] 焦佩. 海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观点比较及其启示[J]. 探索,2020(1):178-188.
- [17] 郑金洲. 教育理论研究的缺失——世纪末我国教育理论的反思[J]. 教育发展研究,1999(10):20-24.
- [18] 秦志希,单波,王瀚东,等.“跨国跨文化传播”笔谈[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3):370-380.
- [19] 程军,姜博. 2012—2014年中国教育学期刊国际影响力现状及思考——基于《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的统计分析[J]. 中国高教研究,2015(7):41-47.
- [20] 威尔伯·施拉姆. 传播学概论[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74.
- [21] 蔡拓,杨昊. 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中国的选择与实践[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10):95-115.

**The Dilemmas and Breakthrough Strategies of Chinese Educational
Discourse in Prod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YU Kai,WU Jinglu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Educational discourse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a country to introduce educational policies, exchange educational ideas and establish its national educational imag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eeds to better produce and disseminate educational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mprove the discourse power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he prod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al discourse are faced with two kinds of difficulties, which are the weak productivity of educational discourse and the lack of positive response.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China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onstruct the distinctive education discourse, achieve the balance of diversity and universality, and improve the adaptability of discourse. It also needs to balance ideological expression, develop more flexible strategies to disseminate education discourse, and explore more effective ways through public discourse products.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ducational discours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cultural exchange

责任编辑 曹 莉

网 址: <http://xbjbjb.swu.edu.cn>